

「感情記憶」的印痕

——歷史敘述的主觀性與客觀性

伊東貴之

大約出現於十多年前的一樁話題，使筆者對中日兩國的歷史、歷史觀以及關於對歷史的認識有了稍以考察的機會。今願藉此，對有關日本稱之為「南京事件」（中國稱為「南京大屠殺」）在中日兩國間的認識落差與不同，圍繞着相互間的齟齬，其由來及原因、解決方法及朝向和解的渠道，兼及日本國內論壇的議論等，稍談一下陋見。

1999年，筆者在中國中央電視台黃金時段的《實話實說》節目中，看到曾親身經歷南京大屠殺的一位日本老兵對當時事件的淒慘回憶。其對前非之痛悔及謝罪，使筆者也受到些心靈的衝擊。這位老人名叫東史郎，曾因1987年出版的從軍日記《わが南京プラトーン——一召集兵の體驗した南京大虐殺》為世所知^①。此書的中譯本《東史郎日記》於1999年由南京的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②。在此之前，筆者曾通過「戰爭記憶」討論會，知道東史郎作為少數理解中國人憤怒與傷痕的日本人，在中國甚至被視為英雄；相反，東史郎在日本國內除了圍繞着因他那本書所引起的有關訴訟的報導外^③，其知名度相當低下。這不由讓人深思，兩國間在這一事件上的認知存在如此之大的落差，原因何在？

《實話實說》的這一段節目播放後，日本部分媒介將之視為中國中央電視台煽動華人民族主義情緒的典例而加以批判。誠然，在日本國內否認南京事件存在或對此事件輕描淡寫的議論屬極少數；但對中國政府宣稱南京事件被

* 本文是基於筆者在「『中日視野下的東亞知識體系構建』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所宣讀的論文〈「感情記憶」之烙印——歷史敘述中的主觀性·當時性與共感·客觀性〉增改而成。該會於2010年9月24日在南京大學召開，由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與日本人類文化研究機構、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主辦。筆者謹此，再次向有關單位，尤其是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各位教師的熱情關切與情誼，致以深深的謝意。

害者有三十萬人的「實證性」，卻有相當多的日本人持懷疑態度。中國方面，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孫歌（也是日本思想史研究者）曾於2000年在日本學術刊物撰文指出，南京大屠殺象徵着中國人的憤怒，象徵着無可修復的感情傷痕之溝壑；綜合言之，受害者數字僅是確認敵我的表面現象，然而在有關數字的爭議中，具體的「事實」本體卻並沒有成為首要問題④。

人類的認識本來就受歷史制約，如果說人類的認識定會挾帶着「價值」傾向的話，那麼「被害人三十萬」這個數字，即便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有其政治性，那也是當然的吧！問題是將這種對數字主張的精確性無限誇大，並將這種源於「感情記憶」的數字牽強附會地與所謂「科學」、「實證性」、價值中立且「具體」的數字對峙，倒實在是愚昧之舉。如果說後者實際上也是根據一種「政治性」主張、要根據數字等（具體）而言，且對「他者」的感情痛楚毫不介意或毫無感覺，那它實際上就是一種拒絕對話交流的態度；雖然另一方面或許可看作是因對話交流而引起的挫折感。不幸的是，這種齟齬與無對話交流的狀況一直持續，非對稱的關係竟然成為目前中日兩國關係的本質，影響深重。

對孫歌的見解，從事中國思想史研究的溝口雄三教授撰寫了〈為創造日中之間知性的共同空間〉一文，加以回應。在該文中，溝口提請讀者注意到「感情記憶與事實記憶的差異」，並尖銳地指出部分人的不良企圖：「……要將感情記憶的非科學性引入歷史的科學性中，並以歷史之名義，合法地抹殺記憶，以達到將事件整體轉為非歷史化的目的」。對於「被害人三十萬」這個數字，正如溝口所言，其並非單純地顯示着「政治對抗度」，而是應該將其理解為「對全體日本人怒火中燒的度數」，問題的本質實際上是要將「過去感情記憶作為戰後責任的現在進行時，使之歷史化」而已⑤。



「被害人三十萬」這個數字，應該理解為「對全體日本人怒火中燒的度數」。

對於孫歌強調南京大屠殺的「象徵」意義，筆者個人認為，從日本人的角度而言，廣島原子彈事件或許可以成為一個相對應的例子。也就是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日雙方都懷有當事者之外的想像力以及感受到超過分寸的「強度」與「痛覺」；另一方面，也都有一種不論善惡，將某個視為（國民）特別屬性的「故事」化為全體國民故事的想法。不過說到這裏，有必要提一下即便在當今美國，由於美軍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而使戰爭及早結束的論調，仍深扎於社會中。令人記憶猶新的是，在1990年代中期，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博物館曾試着展出核彈爆炸受害者的實際狀況，展品中還包括了向廣島投下核彈的飛機埃諾拉蓋伊（Enola Gay），但因受到退伍軍人團體等的強烈抗議和壓力，該展覽不得不中斷。

日本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與法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西蒙（Claude Simon）之間的爭論，也可視作這方面的另一要例。針對大江批判法國1996年在該國太平洋中南部的殖民地玻里尼西亞（Polynesia）島上的核試驗，西蒙嚴厲回應道：即便大江在「主觀」上有「良心」，但日本對過去侵略亞洲避而不提，也不批判日本現在甚至還在美國核保護傘下的事實，卻僅單方面強調「廣島」的悲慘，在道義上是有失公允的。筆者不憚誤解，認為西蒙的批評與指責道出了日本人易忘的盲點與陷阱，尖銳地衝擊了某種偏執以及毫無自覺性的獨善。不過另一方面，日本也有人不服西蒙的指責，撰文反擊，說西蒙自身也免不了受歷史之制約及表述上的偏執與謬誤，並令人感到其根深蒂固的東方主義情結^⑥。

為了進一步開展對上述問題的討論，加深認識，孫歌與溝口雄三在日本國際交流基金亞洲中心等機構的贊助下，在2000年後數次召開由中日兩國知識份子、媒體人以及市民等組成的「日中認知共同體」對話討論會，筆者也曾躬身參與。通過與會，筆者感到，要達成中日間真正的「理解」，必須涉及到前述的隔閡根本之因由以及中日語言對「理解」的不同解讀，否則無從實現。這應該也是歷史、社會對來歷及表述不同的「他者」所持有的「想像力」問題。溝口還提倡在複雜「現實」「認知」的基礎上要「面對歷史的磁場」，並從原理上進行了探討^⑦。當然，日本學界中對孫歌和溝口的上述議論也有不同的看法。如古廐忠夫撰文〈不應將「感情記憶」與「事實記錄」對立起來〉和砂山幸雄撰文〈圍繞着戰爭的兩種記憶〉，都強調不可忽視實證主義歷史學的重要性^⑧。

我們其實不應忽視孫歌和溝口雄三的議論：不能依據己方的想像力為基礎，而是要以「他者」的想像力為基礎，以喚起對紛繁複雜的歷史諸層面的認真研考。以這種認識來處理兩國間的認知差異，意義重大，非同一般。顯而易見，兩人並未否定歷史敘述過程的「科學性」和「客觀性」，也沒有輕視它們的意圖。大體而言，極端反實在論的看法與史學是無法共存的，作為「客體」的史學研究當然是重要的。

因此，從某種意義來說，我們或許會碰到以堂堂正正面目出現的兩難困境。這使得我們即便在面對包含當事人在內的非對稱、在關係上本質根本不

同的同一「事實」時，也必須認真地審視影響中日兩國間真正「理解」的隔閡根本，找出為甚麼無法理解隔閡原因的根本所在。

當然，古廐忠夫與砂山幸雄的擔心，自有相應緣由。這與近年來歐美史學界對傳統近代史學產生重大懷疑與挑戰以及論爭不斷有關。其中有一部分人對史學界所謂的「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產生懷疑，認為史學遇到了本質上的危機。這種懷疑是在廣義的後現代思想及語言學、分析哲學影響下產生的，簡而言之，是認為每個人都在語言的規束中，不通過它則無從思考。這些人參照其他相關學說並從中得到共鳴，在此基礎上孕育出諸如「語言」的分析、有關歷史的構成主義等理論與思考方法，對企圖依據方法論及認識論建構史學卻陷入困境的史學界人士起到了某種刺激作用；不過，學界中也有人警覺到這種理論的危害性，認為假若完全照搬那種前提和思考方法，自然會得出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客觀的、透明無疵的史實那種極端結論，如此一來，人們自然也會懷疑史學自身存在的價值^⑨。

我們再回頭審視日本的史學，就有必要在此提一下近年來日本新歷史教科書編寫會等根據所謂「自由主義史觀」對歷史修正主義的認知。筆者個人認為，其之所以能有相應的說服力，就是因為具有某種程度的懷疑主義和價值相對主義思想蔓延的背景。在這種狀況下，近年日本社會就出現了宛如「講故事」(物語)、「言說」那樣的相互爭鬥鬧劇。也就是說，倘若輕視客觀「事實」，追求後現代性那種「歷史=講故事」論調的立場，不用說南京事件/大屠殺，即便是從軍慰安婦問題也可因這種立場而編造出完全不同的故事版本；若走極端，則更會根據敘述者的需要肆意捏造歷史。

我們或許可以說，問題因此又回到原點。當然由於「事實」的存在，明顯的缺漏自然歷歷在目。人非神靈，「客觀」地認識事實，並將其中的某些「真實」絲毫不漏地挑出來實際上並非易事。譬如在歐美諸多語言中，「歷史」同時具有「故事」的涵義，假若以此根據事實將「記憶」逐項排列，並在此基礎上造就「歷史」，可以說其做法本身就成為一種非紀實的契機，自然也會孕育出所謂固有的「故事」來。而且，在認識主體「歷史」的過程中，還經常會受制於價值判斷的偏差。

另一方面，正如古代中國及東亞的先賢所思考的那樣，「歷史」以及「歷史學」本來作為勸戒的史鑒，據其原本之語意，有卓越的「實踐性」和「道義性」。如果按照這種史學傳統，那麼在認識「客觀性」「事實」的同時，對於不同語言文章之表述及不同來歷的「他者」之同感以及想像力，筆者認為也應是敘述歷史時必須具備的首要條件吧。

綜上所述，我們可知要不偏不倚地、一字不差地表述「真實的話」確實難以做到。不過，重要的是要不懼山險路窄，為達頂峰，竭力而為。與此相反的是，如果認為世上本無「真實」，一切都是「言說」，將歷史當作非紀實小說，就會將事實抽象化，以至思考產生惰性，此舉極其不當。

另外，還有對於如何講「實話」的問題。鑒於「事實」在歷史表述上有複雜的多義性，因此如何剝去外層的迷裝，現出真實，需動用多種研究方法。正

如孫歌所示，我們首先需要排斥思考的惰性與抽象化，絕不能讓其普遍化並被「政治性」的歧路與情緒性的老套路吸收。在敘述歷史時，我們必須找出其中錯綜複雜的現實涵義、其獨特性，以及其無法替代的可能性。其實歷史敘述原本豈是為了「政治」，也更不是最早作為「科學」的「歷史學」問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倒是接近被稱作「文學」的領域。

呂玉新 校

註釋

① 東史郎：《わが南京プラトーン——一召集兵の體驗した南京大虐殺》（東京：青木書店，1987）。此書在維基百科的漢譯書名為《我們的南京步兵聯隊——一個召集兵所體驗的南京大屠殺》。

② 東史郎著，張國仁等譯：《東史郎日記》（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該書的英文版，參見Azuma Shiro, *The Diary of Azuma Shiro*, trans. Kimberly Hughes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ress, 2006)。另一個篇幅較短的版本，參見東史郎著，紀廷許、王丹丹、王鍵譯：《東史郎戰地日記：1938·10-1939·9》（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

③ 關於「東史郎訴訟案」，概況如下：東史郎在其日記中，曾提到他的原分隊長橋本光治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的殘暴行徑。在日記出版後長達六年的時間裏，橋本沒有提出異議。1993年4月，橋本以日記「記述不實、毀損名譽」為由，訴訟至東京地方法院，狀告東史郎、青木書店和該書編輯下里正樹，要求登報公開道歉並支付損害賠償金兩百萬日元。東京地方法院經過三年的審理，於1996年4月26日作出判決，認定《東史郎日記》中有關「水塘」、「郵袋」、「手榴彈」等記述為虛構，判處東史郎等被告敗訴，各向橋本賠償五十萬日元。1998年12月23日下午，日本東京高等法院對《東史郎日記》上訴案作出東史郎等再次敗訴的判決。

④ 參見孫歌：〈日中戰爭——感情與記憶の構圖〉，《世界》，2000年4月號，頁158-70。

⑤ 參見溝口雄三：〈日中間で知の共同空間を創るために——孫歌論文に應じて〉，《世界》，2000年9月號，頁127-38。

⑥ 參見平野千果子：〈フランス人の植民地問題をめぐる記憶——「大江・シモン論争」を手がかりに〉，載三浦信孝編：《普遍性が差異か——共和主義の臨界、フランス》（東京：藤原書店，2001），頁173-90。

⑦ 參見溝口雄三：〈歴史を物語るということ〉，《日本史研究》，1999年第446號，頁12-22；〈歴史學における共感と科學性と主體〉，《日本史研究》，2000年第451號，頁41-53。

⑧ 參見古厩忠夫：〈「感情記憶」と「事實記録」を對立させてはならない〉，《世界》，2001年10月號，頁136-46；砂山幸雄：〈戦争をめぐる二つの記憶〉，《神奈川大學評論》，2001年第39號，頁64-77。

⑨ 參見小田中直樹：〈言語論的轉回と歴史學〉，《史學雜誌》，2009年9月號，頁88-100；川北稔：〈歴史理論〉，《史學雜誌》，2001年5月號，頁702-706。